

骑海豚的少年

刘淳

古代人使用骑乘海豚的意象，其中的情感可能并不仅限于善意和友谊。海豚对人类可能存在的爱欲的故事，亚里士多德已颇为熟悉。

文献记述展示了动物所能达到的情感深度和广度，展示了大自然令人惊叹的多样性，以及美和欲望的普遍力量；而这些故事所赞颂的美，仍然是人类之美。

他的绳索自然脱落，香醇的酒漫过船舱，酒香四溢，葡萄藤爬上船帆，缠绕桅杆，开花结果；而酒神自己则变成一只怒吼的雄狮。除了曾主张释放酒神的舵手，其他船员都在惊吓中投入大海，随即被变成海豚。而在《致阿波罗的荷马颂诗》中，海豚以另一种方式与神明发生了关联。阿波罗建立了自己的神谕所后，需要寻求供奉的仆人。他看到有一只来自克诺索斯、满载克里特人的航船，便化身海豚跃上大船，将航船和船上之人带到自己的圣所，教他们履行对自己的祭祀和崇拜。这个故事从词源上解释了阿波罗的一个圣号（*Δελφίνος*）以及德尔斐（*Δελφοί*）名称的来源，它们都来自希腊语的海豚（*δελφίς, -ῖνος*）一词。

这个约前480年的红绘水罐则展现了一个神奇的场面（图⑤）：瓶画中的阿波罗头戴月桂花环，背着弓箭，指间拨响里拉琴，乘坐一只只有三只鼎；下方的海面上有一只章鱼，两侧各有两条鱼儿；而更为突出的是，三只鼎下部左右，各有一只跃出海面的海豚。瓶画不仅展现了阿波罗所执掌的几个方面——音乐、射术和占卜，也体现了海豚与德尔斐神谕所的联系，以及与人类互动的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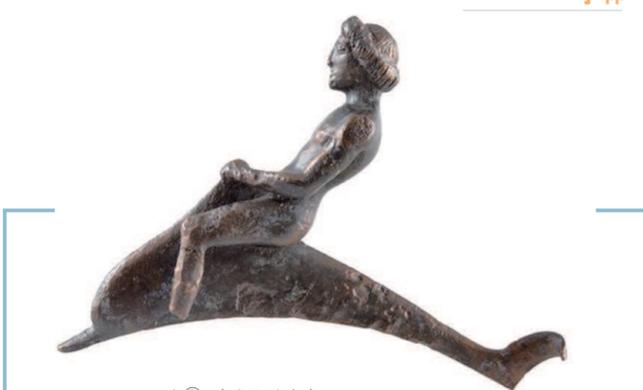
文本材料中海豚救人的故事

让我们回到少年骑乘海豚的艺术形象。虽然艺术作品中也有如爱若斯等次要神明骑乘海豚，但我们此时更为关心的是人类骑乘海豚的意象。哪些人会骑上海豚，又是什么骑乘海豚？人与海豚之间存在怎样的情感联系？我们在文本材料中首先找到的便是海豚救人的故事，其中以希罗多德《历史》中阿里翁的故事最为著名。

据希罗多德说，阿里翁是当时最好的里拉琴演奏者，他首先创作并命名了酒神赞歌，并将它教授给科林斯人。后来，在阿里翁从西西里返回科林斯途中，水手图谋他的钱财，迫他自尽或投入大海。阿里翁要求进行最后一次演奏；他奏响里拉琴，唱了一首高音调的曲子，然后跃入大海。希罗多德记述道：“据说一只海豚驮起阿里翁，将他带到台那伦海岬”。希罗多德还说，台那伦有一座男子骑海豚的青铜雕塑，据说就是阿里翁的奉献。希罗多德并没有强调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没有解释海豚救人的原因，但他笔下阿里翁的传奇经历，不仅暗示了海豚与多位神明的联系，也特别凸显了海豚的性情：它们热爱音乐，也喜爱人类。

现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一枚银币（约前334—302年）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图⑥）。这是意大利南部塔伦图姆发行的银币；从公元前四世纪早期开始，这里的钱币基本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一面是骑马的武士，另一面则是骑乘海豚的年轻人。学者们对钱币上骑海豚者的名字尚有争议，但背后的故事是一致的：传说中此地的创立者曾遭遇海难，被海豚救下，于是这里铸造的钱币就表现了他骑乘海豚的情景。

在器物上表现海豚的形象，以铭记这种动物对人类的帮助，也见于许多文本材料。普鲁塔克在谈论动物之暂时提到，特勒马科斯年轻时曾坠入海中，海豚救了他，并陪着他游回岸边；故此，



▲① 骑海豚的少年

▲② 宙斯化作公牛掠夺欧罗巴。石灰石排挡间饰，约前540年，下方为海豚代表大海。



▲③ 伊特鲁斯坎黑绘水罐，约前530年，描绘了英雄珀尔修斯对海中怪兽的场景（一说是赫拉克勒斯）。周围环绕的海豹、章鱼和海豚代表着故事发生的环境：大海。



▲④ 基里克斯陶杯，埃克塞基亚斯所制，约前530年



▲⑥ 克利夫兰博物馆银币，反面



▲⑤ 阿提卡红绘水罐，“柏林画工”所绘

奥德修斯在戒指上雕刻了海豚，在盾上也装饰了海豚的纹饰，以表报答之意（《道德论丛》）。普鲁塔克还记载了好几种海豚帮助人类的故事，他认为，在陆上和海上的动物中，海豚是唯一一种因为我们的人性本身而喜爱我们的动物，不像某些人类驯养的动物，海豚与人为善，却并不追求任何好处。我们看到，尽管古代人并没有现代的手段来充分了解海豚的生理，尽管以上提及的古代记述不一定都确有其事，但这些故事显然来自真实的生活经验，因为它们无不真切地体现了海豚的聪慧和喜好接近人类的天然性，而这也现代科学研究中不断得到印证。

“这被阿弗洛狄特支配的鱼类”

不过，古代人使用骑乘海豚的意象，其中的情感可能并不仅限于善意和友谊。让我们来看看《帕拉丁诗选》中提及海豚的两首诗。一首匿名小诗描述了一个陷入情网的男子，诗人说他“喘息着，就像一只海滩上渴望海浪的海豚”，即使是珀尔修斯的弯刀，也无法斩断束缚他的情网。海豚出现在爱欲的

语境中，也许出乎现代读者的意料。用海豚来比方渴望男孩的爱人，只是偶然吗？这种类比，只是因为爱人的渴求，与搁浅的海豚相似吗？另一首梅利埃格（约公元前一世纪）所作的小诗再次提到了海豚，并且强调了骑乘海豚的意象：

为爱所苦的人们啊，南风为水手们吹起惠好顺风，

带走了 Andragathus，我灵魂的一半。

航船是三倍的幸福，海浪是三倍的不幸，

带走男孩的风儿是四倍的有福。

我真希望我是一只海豚，这样就能将他驮在肩上，

让他得以渡海，见到有着可爱男孩们的罗得岛。

这是一首送别诗，一般用于分别的场合，向离开的一方表达旅途顺利的祝福。诗人在开头就告诉我们，助力水手的顺风（南风）已经吹起。但诗人不等第一行结束，就急忙用呼格表明了自己情感诉说的对象：为爱所苦的人们。于是，即使是并未经历情感煎熬的读者，也会注意到这首诗所要传达的主题：送别只是诗的形式，而它的内容和情感则是有关爱欲的。心爱的人儿离开了，诗人魂不守舍，此时的他却羡慕航船、海浪和风儿——这些造成分离的事物，因为它们拥有他此时不能拥有的男孩。

但这首诗引起我们兴趣的则是它的第三个对句：但这里，诗人希望变成海豚，驮着男孩越过大海，抵达他的目的地。初看上去，这里的手法并不新鲜；在希腊爱情诗传统中，爱人常常希望自己变成某种东西，从而得以亲近所爱之人。但这里海豚的意象并不是随意的。有学者指出，诗人希望自己能够化身海豚，驮着心爱的男孩到目的地，在这种表达背后，是一系列关于海豚对少年产生爱欲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基本构架在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和三世纪早期就已经成型了。梅利埃格的诗在此戛然而止，但要理解诗人所寄寓的感情，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些梅利埃格及其同时代人所未熟悉的、有关少年骑乘海豚的故事，以及这一意象的情欲意味。美国学者威廉姆斯的研究文章梳理了大量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动物爱恋人类的叙述，限于篇幅，我们选择考察几例前四世纪以降的材料。

海豚对人类可能存在的爱欲的故事，亚里士多德已颇为熟悉。他在《动物志》8.48提到，有许多证据说明了海豚的温柔和顺，特别是海豚对少年人的爱意与欲望。其中提到的 *ἔρως* 和 *ἐπιθυμία* 都表达了超乎一般友善关系的强烈情欲，而这种情感的对象则与上文两首小诗中爱欲的情感对象一样，都是少年。亚里士多德还提及了海豚对少年展现爱欲的地点：塔伦图姆、卡里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们无法确定，此处涉及塔伦图姆的是怎样的故事，是否与上文提到的钱币背后的故事有关；但关于小亚细亚的卡里亚，则有另一条相关记载。萨摩斯的杜里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到三世纪早期，他有一段关于海豚爱上少年的叙述。虽然杜里斯的作品失传了，这段记载却保存在阿忒纳乌斯的《智者之宴》中。根据阿忒纳乌斯转述，雅索斯有一个叫做狄奥尼西奥斯的男孩，某天与其他伙伴一起到海中游泳。一只海豚向他游去，将他驮在背上，驮着他在海中游了很久，又把他送回岸边。雅索斯是卡里亚的一个地方，亚里士多德提到卡里亚的事情，可能指向的就是这个故事。这里，海豚对少年的喜爱是突然发生的，似乎是少年在海中游泳的风姿打动，而海豚表达爱意的方则是将少年驮在背上，在海中游了很久。

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简要概括，老普林尼详细记述了好几个海豚与少年相恋的故事（《博物志》），并总结说，这种事情有无数例子。他所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巴亚一个穷人家的儿子在上学路上，会带着吃食召唤海豚，而海豚对少年怀有奇妙的情意，只要听到召唤，就会跃出水面。每一天，海豚都会驮着少年渡过大海，送他到读书的地方，然后再驮着他回到巴亚。如

是若干年后，少年因病亡故，海豚在海边久等少年不至，也郁郁而终。公元二世纪的奥卢斯·格利乌斯在其《阿提卡之夜》中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这是他从希腊作者阿皮翁的作品中读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海豚爱恋少年的记述，与希腊神话传统中的某些故事截然不同。在神话传统中，当神明化身动物引诱凡人时，喜爱凡人的并不是真正的动物；而像克里特岛王后帕西法厄爱上公牛、与之生下弥诺牛这样的故事，则是被当作耸人听闻的故事来讲述的，是神降下的惩罚。但是，在老普林尼和格利乌斯讲述的故事中，喜欢上少年的确实是海豚这种动物；这些故事也都是被当作真实的事件来记述的。比如，老普林尼强调，这个故事还有许多作者也记述过，故此是可信的；格利乌斯则说，阿皮翁宣称此事不仅是他亲见，还有许多别的目击者为证。

或许可以从这些“真实故事”的故事模式和用词中，找到其背后的意义。比如，格利乌斯用希腊文转述故事时说，男孩子骑着海豚，就像骑马一样，海豚会驮着他游出很远，整个罗马和意大利的人都出来看“这被阿弗洛狄特支配的鱼类”。爱神阿弗洛狄特唤起的，是强烈的爱欲；不过，在威廉姆斯所梳理的有关海豚爱恋少年的故事中，这种强烈的情感往往以死亡或分离的方式中断。雌性的海豚爱恋风华正茂的少年，但不会真正发生交合，更不会像神话传统中异性人兽结合生下后代的情况。威廉姆斯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格利乌斯的叙述中出现了一个希腊文词汇，称少年是“被海豚所爱之人”。不管它是阿皮翁原本的措辞，还是格利乌斯的创造，这个词都将海豚和少年的关系置于希腊少年爱传统的传统中：海豚是更为年长的爱者，而少年则是欲求的对象，是被爱者。在古希腊少年爱传统的理想模式中，情欲（*eros*）是由年长的爱者主导的，而年少被爱者不该有身体的欲望，只应心怀因钦慕和感激而生的爱（*philia*）。我们看到，上述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海豚爱恋少年的记述，几乎成为这种理想关系的投射。这些作者相信海豚确实可以产生对人类的爱，而这种爱意从未以身体结合的方式达到“圆满”，而是止步于心灵上的喜爱和情感上的依恋。而梅利埃格在小诗中渴望化身海豚，驮着心爱的男孩渡海，便是以少年骑乘海豚的形象，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爱欲关系的渴望。

* * *

在威廉姆斯的文献梳理中，爱恋人类的还有许多其他物种，海豚属于来自海域的动物。正如威廉姆斯所总结的，这些记述展示了动物所能达到的情感深度和广度，展示了大自然令人惊叹的多样性，以及美和欲望的普遍力量；而这些故事所赞颂的美，仍然是人类之美。

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些故事中“并未达成”的爱欲，探索了有关爱与欲望的核心问题，而这正是古代希腊罗马哲人反复思考的问题。柏拉图《会饮篇》中的迪奥提玛说，爱若斯（*Eros*）是富有通贫产生的私生子，一直习惯于穷困的生活；所以，爱是一种缺乏（而不是满足），爱者永远处于追寻的状态。加拿大大学者安妮·卡尔森在她的著作《苦甜的爱若斯》中也说：“希腊词语 *eros* 意味着‘需要’‘匮乏’‘对没有的东西的追求’。爱者想要他没有的东西。按照这个定义，他不可能拥有他想要的东西，既然这东西一旦拥有，就不再是想要的。”然而，正是有翅膀的爱欲，才能“将渴求的心灵从这那里带到那里，让头脑在故事中起飞”；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古希腊哲人正是陷入了这样的爱欲，追求从已知到未知的超越。在爱欲的语境下，骑海豚的少年，以瞬时的意象表现了这种永恒的追寻：喜爱少年之美的海豚，驮着心爱的男孩游在大海，永远在前进，永远在超越，将爱与美凝固在持续的进行时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

吕思勉与汪叔良的平淡之交

裘陈江

1953年，吕思勉先生依据残存日记，将旧日诗稿编成一册，加上评注注释，送请赵元成、陈协恭、汪叔良三位老友教正。后来其《嵩庐诗稿》出版时，将自评和三人评语均录入诗后。赵、陈原是早年诗侣，汪叔良则是中华书局任职时的同事，均是一生挚友，其中吕、汪二人的关系罕为人知。

汪叔良，光緒十三年（1887）出生于江苏镇江。父亲汪启为其取名德厚，汪氏后来亦自署汪厚，以茹茶室、梅花楼为斋名，自号茹茶室主、梅严遛叟等，笔名有厄生、茹茶等。六岁入塾读书，1905年入长兴吴三县高等小学堂肄业。翌年，从朱伯虞习英文，年底考取江苏优级师范学堂。1907年，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1914年初，一度在上海闵行小学、私立女中任教，5月入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校对。退出中华书局后，在沪苏两地往返奔波，仍从事

教育事业。1952年，在上海民立中学退休后回苏。

1953年吕思勉整理的诗作便由汪叔良誊抄。笔者有幸得见汪叔良的部分书信、自定年谱残稿，有不少与吕氏的往来记录。其中有一份手稿，记录其帮吕氏誊抄诗稿的情况，并附长评一则，写道：

顷读吕诚之先生和其友敬谦诗，有句云“摩天健羽摧”。敬谦原作为“相思鬓渐摧”。窃以为“摧”字似嫌勉强，以为应用“衰”字。忆幼时读贺知章诗“乡音无改鬓毛衰”，当时但知为鬓发之白之意也。《全唐诗》亦作“鬓毛衰”，而后章燮所注《唐诗三百首》作“乡音无改鬓毛摧”，注“催促”也，言鬓毛催白，以为催白二字似未妥。又见王尧衢所注《古唐诗合解》则作“乡音无改鬓毛摧”，注云“鬓毛摧败，老惫不堪”。俞汝昌所注《唐诗别

裁集》亦作“鬓毛摧”，且注云“坊本作毛衰”，衰乃四支韵，恐是“摧”字之误，今改正。《全唐诗》作“鬓毛衰”，坊刻《唐诗三百首》则根据《全唐诗》作“衰”，不必改易。贺知章原诗本作“衰”，集韵十灰，衰音催，仓四切。与《论语》“子昆夷衰”之“衰”音义同。

评语提及的诗是《庚申端午客沈阳得敬谦寄诗次韵奉答》，《嵩庐诗稿》中附有赵元成原诗。汪氏就其中“摧”字提出商榷，该评语为《诗稿》所无。

笔者还见到一通吕思勉去世前不久致汪叔良的信，写于“七·卅一”，未收录于《吕思勉全集》和《吕谱》。信中提及：

中华事已有消息否？弟此月许困于左眼结膜炎，又直溽暑，不能作事，间又无聊闷损之至。委撰大作诗序，弟文殊不相称，今日勉成之……仅百首

之仅字，乃通近之文（非以为少），唐人诗皆如此用，如韩文“张巡初入睢阳城中仅万人”，杜诗“危楼仅百所”是也。《旧唐书》《五代史》中如此用者尤多。

关键内容为汪叔良诗集作序，从吕氏《汪叔良《茹茶室诗》序》及《吕谱》可知，该序作于1957年7月30日，故可知此信作于7月31日。提到吕氏晚年受困于左眼结膜炎，还勉力为老友作序校诗，可见交情深厚。信未提到的唐代“仅”字古今异义的法是吕氏颇为得意的发现，早在《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法》一文中也说过：“如仅字，我们现在使用之法，是意以为少，唐人使用之法，则意以为多（仅字的意义，乃接近某数，如九百数十，近乎千，九千数百，近乎万是。）我们所使用的，实在是古义，然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之‘城中仅万人’，所使用的亦是唐时俗义，便是其一例。”

《吕谱》还有两封1957年汪叔良致吕思勉的书信，可以与此信互证。其一是一通残信，提及诗稿之事，追溯了两人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弟平生所作诗，虽亦有二三百首，但自觉可存者甚少。然散帙千金，未忍遽弃。去年夏间曾将历年旧作，凡有语病者，或自觉有疵谬者，尽删除之，仅留九十余首，录为一卷。将以就正于吾兄，乞指其疵

谬。自念平生知己，今惟吾兄一人。盖自甲寅之夏，共事于中华书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结合《吕谱》可知，吕氏自1913年7月至1918年秋，由同乡前辈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的沈颐介绍，正好任职于中华书局。

另一通是同年8月1日汪叔良致吕思勉的书信，从内容来看，便是紧接着吕氏佚信的回复——汪氏接到吕氏所作序言，且已有两月未通音信，自然是惊喜不已，因而再次强调二人的交情：“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而，惟公一人而已”。对于吕氏在信中提及的年龄问题，确实如吕氏所言年长三岁。而结交时间，汪氏在前面佚信中也回忆称是甲寅年，此时经吕氏复核后改作乙卯年，故将时间改为四十三年。后来汪氏《梅岩通夏手订年谱》便将二人结交的起点定为乙卯，应据此改正。信中谈及自己和家人贫病的“老来苦”。汪氏苦状，吕氏应是一直知情和关注的，也曾略有帮助。1955年10月19日，吕氏在与好友顾颉刚的信中引荐汪叔良校点古籍，应是为其生计出谋划策。而在顾颉刚子女的回信中，汪叔良还曾担任过顾德辉的老师。顾氏与之接触后，敬如宾，且对儿子讲“这真是做学问的人，可惜生不逢时”，并提到曾托汪氏做古籍整理的工作，且十分满意，相信其中定有吕思勉的推荐之功。（顾自珍、顾

德辉：《慈父与严师——纪念先父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

与之相应的是，1956年汪氏致信古籍出版社自荐担任古籍整理工作，其中提到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会要》和《经传释词》便是由其校点，很可能是顾颉刚推荐的。从后来出版的情况看，二书均未署汪氏名字，只是以“校点者”的身份出现。

由吕思勉晚年留存的日记可知，二人此后保持书信往来，还曾晤面。吕氏是1957年10月9日深夜去世，而9月1日还与汪叔良、陈协恭等人晤面，5号和7号与汪氏仍有书信往还（均遗失），到10月7日又与汪、陈等人晤面，只是这一次几乎等同于老友们最后的告别了。汪叔良不久也于1961年在苏州去世，身后遗稿散失，仅《茹茶室诗稿》一部因当时稍有油印而得以传布。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